



城市文學節 2014 開幕暨座談會

日期：2014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3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 6 樓惠卿劇院

主持：鄭培凱教授

司儀：張洛寧同學

記錄：郭俊瑤同學、梁曼姿同學、竇妍同學

司儀：各位來賓，我們的開幕式即將開始，為保證活動順利進行，請將手機調至震動或靜音模式。謝謝您的配合。

各位嘉賓、各位同學：

大家好！歡迎各位蒞臨香港城市大學「城市文學節 2014」的開幕典禮暨文學座談會活動。我是今天的司儀張洛寧，就讀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系三年級。

一年一度的「城市文學節」又到了。今天很高興看到有許多文學愛好者來參加這次盛會，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樣，非常期待各位知名作家的光臨。

今年「城市文學節」的主題是「生活在城市」，除了稍後即將舉行的文學座談會之外，文學節即將舉辦的活動還有：「城市文學創作獎」、「分組交流會」、與教育局合辦的「與作家對話交流會」以及「新詩寫作工作坊」。城市文學節致力於鼓勵港澳兩地的青年發揮文學才能，我們希望以多樣的形式，豐富的內容，為青年文學愛好者提供與本地和海外名作家交流的機會。

本次文學節順利舉行，在此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合辦單位「香港藝術發展局」以及「澳門基金會」的大力支持。

接下來，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為我們開幕致詞，有請郭教授。

開幕致詞

郭位：各位嘉賓、各位朋友，還有各位作家、評論家，大家好。寫作是不分黨派，不限年齡，當然也跟性別沒有關係，橫跨所有世紀。今天這個盛會，我很高興城市大學能夠在鄭培凱教授的領導之下，在此舉行。這個主題非常有趣，我剛看了一下就想起來，剛來城大，我為城大做了一對對聯，我想和這個相映成趣：「大隱隱於市，學研研出塵」。我們城市大學，世界上一流大學，我們講究專業教育。因為我們在城市之中，好像庸俗一樣，但是在這庸俗裏面，

如果我們在生活、在文學、在創作上能夠傑出，我們等於這才是真正的大隱，對不對。所以真正隱居不一定要到山林裏去，如果要隱居的話，應該來我們香港城市大學。對吧，鼓掌。

（掌聲）

在座的都是修士，「修士」是哪一個「修」，你們知道嗎？不是「休克」那個「休」，是「修學」那個「修」。所以不要搞錯。在「修士」裏面呢，學問、世界的道理都能講通。

長話短說，我們香港城市大學今年慶祝 30 週年慶，這 30 週年慶呢，今天這個活動是一個很重點的節目。我們有很多專家，這邊有座談會，有演講會，還聽說有四百多個青年人的寫作，由這些專家來做評審。我相信，每一篇都非常傑出。我也希望，我的年齡可以跟你們一樣，能跟你們一樣欣賞這個世界的新一代、很 exciting、XYZgeneration 的很多美妙的事情。讓我們一起慶祝香港城市大學 30 週年慶，一起為香港城市大學專業教育能夠更上一層樓再一次鼓掌。謝謝大家，謝謝各位專家。

（掌聲）

司儀：謝謝郭教授的演講。接下來，讓我們歡迎香港城市大學文康委員會鄭培凱教授為我們致歡迎詞，有請鄭培凱。

鄭培凱：郭校長、各位從遠地來的文學節的朋友，還有各位來賓，大家早上好。非常高興，我們塑造了一年一度的城市文學節。今年這次城市文學節已經是第九屆了，想起來也真快。十年前，我們剛開始想城市文學節這件事情，那個時候呢，我們香港城市大學自己有一個簡單的刊物，叫《城市文學》。後來因為文康委員會要負責這件事情。這個刊物呢我們想要怎樣擴大到整個香港、澳門的青年和學生的群體中。當時呢，我記得當時的香港藝術發展局的主席馬逢國，我跟他聊天，這個可以嗎，他很支持，就覺得是，香港藝術發展局就是應該做這樣的事情。所以我們就一講，一拍即合。然後我就說澳門呢，他就聯繫澳門，澳門基金會當時的負責人是吳誌良，現在成主席了，澳門也可以參加，他也覺得是應該。所以我們就開始了，一年一度的港澳城市文學節。

那麼這個城市文學節，是以香港城市大學為基地，每一次都是我們承辦。可是呢，參與的人是香港、澳門兩地的愛好文學的青年。那麼我們每年呢，都有城市文學獎，我們一直都得到社會各界的贊助，有何鴻毅家族基金、澳門基金會贊助，後來還有恒生銀行贊助。蠻有意思的，就是說，他們呢覺得我們在城市當中，剛剛郭校長也有講，在城市當中，那是不是要想着大自然，要環保。所以將你來到城市大學，走到這層樓稍微靠後面一點，看到四個大字：「城市山林」。這些贊助者就覺得，你們在城市裏，你們要多呼籲環保，而且呢，還要跟大自然連在一起。所以我們每一年呢，可能有很多年輕朋友記得，這些參與過的作家、詩人們都記得，每一年的題目都是環保，環保，那麼今年呢，我們後來想說，我們反正是生活在城市當中，就用生活在城市，我們不提環保，我們有一個內心的環保。反正人人都要環保，而且是一個人文的環境保護，不只是大自然，所以我們就整個開放，越來越開放，生活在城市。有許多年輕人，他們來參加徵文，徵文都有評審，評審之後，我們有冠亞季軍，給予一些獎勵。我們希望這個活動能夠繼續下去。

而且，我們這九年來，有好多年輕人，他因為參加了城市文學節，參加了徵文活動，特別是那些得了獎的年輕小朋友，高興得不得了。我就記得我們培養了好幾個作家，從此，他們就投身到文學寫作當中了。所以我覺得文學寫作，非常好。文學寫作不只是一個文字鍛煉的事情，其實一旦你從事文學寫作，不管是寫詩也好，寫小說也好，寫散文也好，文化評論也好，你必定要發覺你自己的聲音，你就走入到你自己的內心，你也要找到你自己。你找到自己，用自己的獨特的聲音來看，為你看到的世界來發聲，你這個聲音是你自己的，也是你關照了整個世界，是你去發現世界然後發出來的聲音。這種聲音比較有內涵。

我時常抱怨香港的報紙，每天有一大疊，也不知道在搞甚麼東西，專門追蹤影、歌星的，一大疊。我覺得世界各地大概沒有這樣的辦報狀況。我時常勸這些辦報的，我也知道他們影響不了他們的老闆，老闆說了算。不過呢我是覺得，假如我們的傳媒可以多注意

文學寫作，其實對下一代心靈的培養，跟對美好世界的追求，至少我們在大學裏，這件事情我們堅持要做的。每年都辦城市文學節，每年我們城市大學文康委員會都會承辦這樣的活動，然後社會上的支持也是持續的，我們特別感動。

今天許多的作者、詩人、小說家都是各地來的，他們告訴我這個青年寫作文學獎和青年寫作文學活動他們一定要來。他們答應要來，讓我非常感動，北島昨天晚上才從上海趕來。所以大家都這麼熱心，大家對文學這塊天地能夠一起再多開闊一點，讓香港在文學藝術上再多發展一點。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我每次說是：也可能是沙漠，不過一定要建立我們的綠洲，我們要一個一個小的綠洲建起來，我知道世界的沙漠化也難免，可是呢，只要我們有綠洲，我們的心靈就有棲息的地方。謝謝大家。

（掌聲）

司儀：感謝鄭培凱真誠的演講。難得各位嘉賓歡聚一堂，在座談會開始之前，有請各位嘉賓上前合照，有請。

（嘉賓大合照）

司儀：謝謝各位。現在有請各位嘉賓講員就座。文學座談會馬上開始，本次座談會由鄭培凱教授主持。現在我就把接下來的時間交給鄭培凱。有請。

鄭培凱：我們按照每年的慣例。我們有兩個慣例，有的時候是從當中開始往旁邊講，有的時候呢是從兩邊往中間講。

陳子善：農村包圍城市。

鄭培凱：是吧。陳子善教授呢，黨的教育教得好。（笑聲）都記得。

我們今年呢，剛剛我問了旁邊兩位，說是從當中開始，還是從旁邊開始，他們兩位說是從旁邊開始。問他們不算數是吧，不過沒有關係，我們從那邊開始。

閻連科是講故事的高手，不過我要提醒他，每位講手只有8分鐘，要不然他80分鐘都講不完。

我們從閻連科開始。

閻連科：許老師，許老師開始。你這樣就真的從農村包圍城市，有點欺負農民。

鄭培凱：哦，不過他也很厲害。他是文學評論家，你要小心。

閻連科：所以從他開始。

鄭培凱：你是小說家。他是評論小說的，最後留給他。

閻連科：鄭老師說從最年輕的開始。他說按年齡開始，從最年輕的。那廖偉棠開始。

鄭培凱：客氣一下，沒關係啦，你就講吧。

閻連科：那我就先講。從農村包圍城市，可是真正在座的農民，其實就我一個。一個人是打不過這麼多人的。那我就開始講。昨天鄭老師講說，大家就講講愛好文學有甚麼好處。我一聽，愛好文學，讓大家讀詩和寫作。那我就講點實在的。他們都講得非常崇高、非常理想。我就講最具體、最實在的。

愛好文學，愛好寫作，最主要一點，讀書寫作可以當飯吃。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餓死的全是農民，沒有一個作家。因此，你們可以想到寫作有多少的好處。當然也有一些教授被餓死，比如說到



了甘肅、那些沙漠地帶，但是你會發現從甘肅的沙漠地帶找到，最後餓死的那個教授，他真的把他的書吃掉了，他又多活了多少多少天。所以我想這是非常具體的寫作的一大好處。

第二大好處，寫作是可以掙很多錢的。這個錢後邊，特別大的故事，我一會兒再說。我想在 80 年代初，我寫的第一篇小說，那個中篇小說，發表的時候，那時候我一個月的工資才二百多塊錢，我的稿費是 760 元。那時候我的母親從農村來，拿着一個雜誌，翻了幾頁。她說，就這麼幾頁就可以掙 760 元，那這個事情還是可以做的啊。你看工資才二百多元，這就七百多元，那我說是可以掙錢的。

第三個，寫作當然不能當官，但是它是可以嘲弄權力的。我想在 2003 年的時候，我還在部隊。我們的部隊分房子，很大的房子，都是司制房。司制房，按大陸的話，就是天舉起的房子，很大很大，170 平米，一個人才只 10 萬元，這個房子就分給你了。但是呢，這 10 萬元當時沒有人去交錢，不是沒錢，人人當官，人人不敢交錢。等人帶頭，等一天等一天，沒有人去交錢。我跟我老婆說，我們也不要交錢，一交顯得我們家特別有錢。等到第七天，老婆說可以了，明天要出差了，今天把錢交掉。帶着 10 萬元去交錢的時候，去交的時候發現我是第一個交錢的。其他人都沒交，說明部長、副部長都還沒交。我就提前交，簽字的時候我說：「我這個錢來得最乾淨，最可以交。」簽字就沒寫閻連科，寫得「閻乾淨」。我想寫作還有非常多的好。

前幾天子東老師告訴我說，茅盾有一個〈論短篇小說〉的論文手稿，賣了 1,200 萬。我當時坐在那兒想了半天，這東西為甚麼值 1,200 萬。後來我想，因為是茅盾寫的，有權力，因為他當過文化部長；有名，大作家；有利。名利權在他就仨了，其他人可能做不到像他這樣，因為沒有當過文化部長。所以我想寫作是真的有非常多的好處。

生活在城市，熱愛文學，熱愛寫作，那才是真諦。其餘時間節約給大家。

鄭培凱：沒關係，那你一會兒可以接着講。我看你意猶未盡的樣子。不過他剛才講到，說矛盾的手稿，賣了1200萬，是你講的嗎？

（指許子東）

許子東：是我講的。現在散佈謠言是有危險的。我估計昨晚講了，閻連科就整個晚上睡不着。他的寫作觀整個改變了。他以後呢，長篇不寫了，他寫短篇。因為他最主要的是手稿，寫甚麼不重要，怎麼寫才重要。用毛筆寫。

鄭培凱：現在輪到你了，交叉講。

許子東：我第一次發表短篇小說，在《百花洲》上，拿到的稿費是76塊。《百花洲》是江西的一個雜誌。可是呢，在這之前，我在江西當農民，一年除掉口糧以外，分到六十幾塊。那個地方算好的，就說工分算比較高的。我就看着這幾張紙，我寫的一個小說，花了一個禮拜寫的，等於我差不多一年的勞動，徹底改變了我的世界觀，毀三觀。（笑聲）從此，1200萬就是最經典的例子，閻連科我真的建議你，寫甚麼不重要，怎麼寫才重要。

另外一點，你剛才說的第七天去交錢。這個《第七天》是余華最近的小說，我有一個感想，我看了《第七天》，我最近又看了《天注定》，賈樟柯的《天注定》。我就把這兩個作品聯繫起來。

上次在科大的時候，余華提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他說：「所有我們能想到的文學當中的魔幻荒誕，現實中比它更荒誕，那我們怎麼辦？」當時在座的劉再復、李歐梵、陳平原，都給他支招，說作家應該怎麼怎麼樣，包括閻連科也在。我看了《第七天》，看了《天注定》，說實話，作為一個做評論的，不滿意。講的都是最尖銳的事情，甚麼富士康的跳樓啊，鄧玉嬌的砍刀啊，種種中國現在，都是真人真事，全部集中在一起。《第七天》裏面的事都是我們每天在網上看到的。但是第一流的作家和導演，把它寫出來，不知道怎麼就不滿意。我也答不出來為甚麼。我就提出這麼一個疑問，今天大家坐在一起很難得，李銳啊，北島啊，鄭愁予這個《美麗的錯誤》啊，這麼多年，真的太想聽到你們有沒有類似的困惑或想法，我就想想《天注定》和《第七天》給我們帶來了甚麼教訓。

鄭培凱：剛才子東講到這個《第七天》，我就想到，李銳還寫過《張馬丁的第八天》呢，你講講這個第八天是甚麼樣的。

李銳：那好，我就講得簡單一點。實際上，我寫的這個《張馬丁的第八天》，從表面上看，它是一個歷史題材的小說。他是寫義和團運動時期，在一個我虛構的地方天谷河兩岸發生的一些故事。寫一個傳教士，因為一起教案，殺死了一個會首。那麼實際上這是個假案。因為這個會首沒有死，他是假死。然後等他蘇醒過來以後，為了維護教會的利益，他不讓教會把這個信息公佈出來。但是這個傳教士堅持聽從主的召喚，他要把真相告訴所有人。所以他被教會趕了出來。而當地的民眾，因為這個教案，對教會產生了極端的仇恨。再加上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於是兩岸的民眾就攻擊這個教堂，屠殺了教堂裏所有的人。結果這個傳教士就去到一個被殺的人的妻子所在的一個廟裏，這個人成為一個神。她認為她已經通神了。這樣的一個結局呢，就非常的怪異。因為她被關在一個廟裏，並且和傳教士生了一個中西結合的雜種。當一切都平息下來以後，所有的血腥，所有的動盪，都過去了以後，在村子裏留下了幾個金髮碧眼的孩子。為甚麼是《張馬丁的第八天》，因為張馬丁在他的墓碑上



他留下了這樣一句話：你們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內，而我的世界是從第八天開始。

我就在講一個人的精神困境，可以使一個人走出上帝的界限，而開始他一個人的創世紀。實際上，我在寫一種精神的困境，我不想讓自己的小說成為歷史的再現，我也不想讓他作為一種社會批判，對於義和團，對於教會的這種強勢文化做一種簡單的社會學層面的批判。因為我覺得這樣的文學都不是文學的上乘。一切藝術，詩歌，小說，美術，雕塑包括建築，一切藝術，它要和人的精神層面發揮關係。

中國有兩個詞很有意思。一個叫「欲死欲仙」。這個詞經常被用來形容，男女相悅，心肉交融的時候，所發生的最最高的境界的感覺，叫「欲死欲仙」。大家不要忘了，這個詞有兩個境界。第一個要「欲死」，「欲死」是甚麼意思。就是要掙脫和拋卻肉身，肉身所給你帶來的快樂達到最高境界的時候，肉身是會局限你的快感的。它就要進入一個更高的境界叫「欲仙」，到「欲仙」的境界，才是一個人對於自己精神的一個最高的體會。以我淺薄的理解，為甚麼在密宗裏面有所謂雙休，他在講一個精神層面的，欲仙的，超越了世俗的所有的一切的精神境界。還有一個詞叫「痛不欲生」。人在最痛苦的時候，他是不想活，他想死。他不是僅僅結束了肉體，而是使你自己的痛苦得到了極大的衍生。所以我的感受，昨天鄭培凱讓我講講文學在你年輕的時候和你有甚麼關係呢，因為明天來的都是大學生啊。

其實，我在講，每個人都曾年輕，一轉眼，也都會衰老。所有的年輕人都是，在產科醫院你可以看到，每一秒鐘都有新人類，從媽媽肚子裏面出來。但是我們中國人的生活，除了衣食住行之外呢，還有琴棋書畫。當然了生活在變化，琴棋書畫已經有了極大的改觀。這個琴棋書畫就是不斷的，一代代人在表達自己精神上處境，在表達自己的精神世界。像我們這代人，年輕的時候，實際上是經歷了一個狂熱的信仰和巨大的幻滅之間的痛苦。這個直接的動力導致了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文革，經歷了種種的中國後來的動盪，使我

們走上了文學的道路。但是我謹記一條，這一條是我認為是無數文學家用自己的鮮血換來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作品變成新聞報道，不要把自己的作品降到社會學、道德譴責等等這樣的層面上來。一定要有那個精神的追求，要有那個精神的表達。沒有這個，你就不要做這件事情。沒關係，你就做一個其他人。你好好兒生活，衣食住行。但是所有衣食住行的芸芸眾生們，都會在某一個時刻，或在某一個事情上，有自己的那個琴棋書畫的最高的精神追求。尤其在中國現在的社會上，這種把文學庸俗化、低俗化、粗鄙化，就是讓它越來越和精神沒有關係，我說這種藝術它都是假藝術。但是人這個東西是複雜的，他一定會有衣食住行，這個都是合理的。但是你想要做真正的藝術，每一個從事這個事業的人，他一定知道，他是和你的深刻的精神處境相關的。好，我已經說的快要超過十分鐘了。

鄭培凱：好。謝謝。下面是季進教授來講，我們交叉着包圍黃子平和北島。

季進：好。很高興來參加這個活動。我先要補充兩點：第一點，閻連科，你趕緊現在出書吧，現在這個行情見漲。第二點：他們剛才在講文學的好處，講了好多。其實還有一點，昨天許子東問我，說季進你為甚麼這麼年輕。我沒有直接告訴他，其實我天天在看小說，天天在看他們的文學作品，文學是可以美容的。

其實我完全同意李銳老師關於文學的觀點，文學是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在 80 年代，應該說是一個純真的時代。那個時候，我們學中文系啊文學系啊，沒有任何的功利的色彩在裏面。完全是懷着一腔文學的夢想，走上文學的道路。而到了 90 年代，大家都說這是一個最偉大的時代，也是一個最糟糕的時代。功利主義真的是已經蔓延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所以閱讀文學就變得彌足可貴。今天能看到這麼多人聚在一起談論文學，討論在城市生活中文學的價值，我覺得特別難得，也特別珍貴。所以能坐在這談論文學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所以應該向你們致敬。

從我個人的理解來講，像剛才李銳老師說的，文學是精神性的東西。它是抒發你內心的感想。不管你從事任何一個職業，文學的閱讀都是有幫助的。一個人的精神力量的強大、精神世界的豐富與文學閱讀是息息相關的。對於當代的作家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我們面臨着這樣一個時代，可寫的東西太多太多了。怎麼能夠用文學的方式來表現這個時代，來傳達這個時代，然後在若干年後，再回過頭來看21世紀，看它的問題在哪。像李銳老師、閻連科老師，像他們的作品，大家如果去關注的話，可以發現每個人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來切入這個時代。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如何和這個時代對話，如何來闡釋這個時代，在他們的作品中，通過他們的閱讀和他們的理解都非常有幫助的。從這樣一個意義來講，我認為文學閱讀都是非常有意義和價值的。好，謝謝。

鄭培凱：謝謝。下面請李黎講講。李黎是特地從美國來的，和我們討論討論她寫小說的經歷。

李黎：各位好。說到城市和文學。我來自美國加州，我住在一個小島的大學城裏面。很靠近一個美麗的大城叫舊金山。講到文學，我在美國居住已經超過四十年了。這四十年來，從我一到美國不久，因為我來自台灣，我就給台灣投稿。一直到現在，到去年，還在出書。可是呢一直都在台灣、中國大陸，在香港也出過兩本書。也就是說，這四十年來，我居住在異國，可是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文字和文學。我出國不久給台灣投稿，出版出書的時候，有人就問過我，你在國外，還要堅持用中文寫作並且在國內發表，那時候也沒有網載，交通信息也不是那麼容易，常常投稿之後有沒有被發表，也不一定知道，所以當被問到說我那時候心情感受是甚麼的時候，我就說，對我來講就像是不斷給我的故鄉寫信，我知道我的信寫出去了，有人會收到，有人會看到，我沒有收到回信，沒有關係，至少我在堅持。用我原來來自我的故鄉的文字在寫，這就是我一直四十多年來堅持一個中文文字的創作，對我來講，因為本來文學就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我們人都有這種溝通的願望。

尤其寫小說的人，有一種說故事的願望，所以說我一直這麼多年來一直用中文寫，剛才閻先生當然是半開玩笑的說，這個寫作的稿費收入很高，其實我在國外，尤其是早些年，不是出版社的錯，而是因為交通溝通不發達，有時候並不一定保證有能夠拿到稿費，所以呢我覺得我得到的一個回報呢就是說我跟我的故鄉，跟我的文字、文學的根沒有斷，所以我說我在給故鄉寫信寫故事，給我故鄉的人，我一定要用我原來的語言，我不會雖然出國用另外一種不是我的母語來寫作的，所以對我來講的話，人都是要有跟其他人聯繫的一種願望，對我來講這太重要了。尤其我不是跟我的故鄉中國在一起的時候，跟他們聯繫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認為寫作對我來講的話，當然是說我寫甚麼對人的心靈種種這些我相信我們可能都知道。

因為我可能比較特殊的作為海外華人作者的身份的話，對我是一種，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救贖，因為這樣子的話我就覺得我並沒有真正離開我的家園。那麼講到這次城市大學辦的城市文學的主題是「生活在城市」，那麼我就想到說我們文學裏頭，城市在我們現代人的生活中當然是很重要，這當然是不在話下的，在城市裏面我們不但有可以得到這種經濟，各種方面經濟的保證，尤其重要的是人文教育，健康這些在城市都可以得到的，得到許多保障，我們另外一方面來講的話，我想從 20 世紀吧，工業文明的發展，尤其是後來科技的發展，城市的各路發展，我們在很多文學作品上，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都會看到說，有些人到城市，懷抱着那種對城市的期待、夢想，然後到了大城市，發現城市的陌生、巨大、無情，甚至財富、罪惡，所以這一切都變成一個文學作品題材，非常非常好的題材，關於這座城市的夢想與這座城市的夢碎，這種文學題材，我們在中外都看到很多很精彩的作品，所以這次很高興來參加這個城市文學節，年輕作者的與這個生活在城市的主題的創作來作評審，看到很多很有趣也很有意思的深度作品，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題材，所以我非常盼望繼續交流，跟各位年青的朋友，並且跟各位文學的同行和前輩請教，謝謝！



鄭培凱：那麼接下來請林沛理先生講話。你說廣東話嗎？

林沛理：對不起，我的普通話太爛了。

鄭培凱：你不是啦，很好呀！不過你用廣東話也可以。

林沛理：Okay，那我用廣東話說了。如果《蘋果日報》的記者今天在這，他們會說我今天在城市大學是在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及香港精神，因為我用廣東話。那當然，《蘋果日報》的記者不會在這，而他們也對我沒興趣。

今年我們的主題是「生活在城市」，其實我在等城大（城市大學）設定一個跟城市有關的題目也等了多年，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說些跟城市有關的事情，特別是評論跟城市的關係。其實我覺得評論跟城市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那為甚麼呢？城市是代表甚麼呢？甚麼叫城市的評論呢？如果大家在香港生活上好一陣子，就會發現香港是一個很城市的城市，有很多城市的特質，譬喻說多元性即 plurality，混雜性即 hybridity。

城市是關於自由的，不同方面的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言論的自由、價值觀的多樣化等等。正因如此，整個城市假如用一個文

學評論的術語來說就是一個 open text，即開放式的文本，而開放式的文本有趣的地方，就在於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剖析原來的文本，這也牽涉到評論的自由，或是說評論者凌駕於評價對象的東西。所以我經常覺得，在香港評論是在做一件很自由的事情，也是一個可以有很大滿足感的事情。而問題就在於，在香港的做評論的人有沒有充份利用到這城市賦予給他們的自由去寫評論呢？

不少人說香港的評論發展很發達，可於我而言，香港的評論業一點也不發達。香港有許多評論根本不是評論，我稱作 random source，或說是表達意見，也有些是隨想，真正能稱得上是評論的只有少數。原因是甚麼呢？原因當然與整個香港的歷史有關係，與香港的殖民地歷史有關，與香港的教育制度有關，與香港的傳媒生態有關，與香港人是否喜歡或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關。也有一件事情，我很喜歡一句話就是「每個人人生下來就有一雙翅膀，可不是每個人都懂得飛翔」，即 We are all born with wings, but very few of us can fly，我覺得其實這就是香港人的問題。在過去的這些年間，香港可以算是最自由的華人城市，那所以說，對於香港人最大的問題是，香港人在這麼多年來有沒有濫用他們的自由，有沒有善用他們的自由。對評論來說這是更重要的問題，既然香港有這麼多的自由，香港人有沒有寫出一些好的評論呢？香港人又有沒有充份發揮他們的自由呢？

今年城大文學節評論組的參賽作品，我覺得，這其實也反映一件事情，即是沒有充份利用評論的自由，特別是作為一個城市人寫評論的自由。這其實包括了许多事情。一個城市不是只有正面的事情，也有許多粗糙在裏頭，城市牽涉到經濟制度、管治方式，背後其實是許多權力的運用，所以我覺得要寫一篇好的城市評論要對權力特別敏感，譬喻 Foucault 所說的 power knowledge，你對 power knowledge 有多 sensitive 是很重要的。反觀香港現今的評論，或是我以較嚴格的標準審視這次文學節評論組的參賽作品，我比較不滿意的一點是，他們對權力的敏感度很低。凡此種種，都令香港雖有寫評論的自由，但水平不高。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牽涉到香港人

有沒有善用自己的自由。

所以說這次的城市文學節，或是整個香港的文化生態，譬如《南華早報》的記者早前問及，有關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借書比率逐年下降，這反映了香港人甚少到圖書館借書。香港人閱讀的風氣，自書展舉辦，至今約二十年，許多人說這證明了香港人喜歡閱讀，因為香港書展是一個很成功的文化活動，事實當然並非這樣。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競爭力下降，這跟香港人是否喜歡思考及閱讀有關，這又牽涉到評論的重點，為甚麼現在關心評論的人增多，因為許多人開始着眼通識及批評性思考，這全都跟評論有關，亦能反映在評論的水平之中。評論的對象在城市中俯拾皆是，每一件事都是評論的對象，我經常說的一點是，若你把城市當成一個文本，其實每件事情都能以評論的角度去分析。

希望香港人能夠以評論的角度去看這社會，評論其實是種生活態度。我想，城市文學節自數年前開設了評論這類別以後，對香港人寫評論的風氣是有所幫助的，希望日後看到香港的評論或城市文學節的作品的水平會越來越高。（掌聲）

鄭培凱：多謝林沛理如此努力的鼓勵香港的年青人多評論。其實寫評論在香港是特別重要，剛才也有講，常常看到很多評論都比較表面，不能深入探討香港這個地方不同文化糾結的問題。我們下面請鄭愁予為我們講講，我們的大師。（掌聲）

鄭愁予：首先要拿出這個手機。因為以前做演講的時候，常常把時間拖得很長，主持人總是很為難，我內人就說你注意 8 分鐘，所以我拿這個手機是看時間的。這個手機，是我們都市生活最重要的一個成員。我們在都市裏看到很多年青人，都拿著手機低頭做低頭族。低頭族在年青人中佔了很大的比重，那麼年紀大的，到了我這個年紀很少低頭族了。

其實這個手機，它不是個機器，它是個倫理的產物。我們的詩人在唐代的時候，寫詩贈給另外一個詩人是為數最多的，皇帝寫詩給大臣，大臣寫詩給皇帝，詩是當初交流的媒介，是最重要的一個

工具。現在手機也是如此，我用手機沒有多久，現在我也會用手機寫詩，很長的詩也有。不過低頭族要注意一點，開車的時候別低頭，那跟酒駕（酒後駕駛）差不多。

所以我說，談到這個都市，我們知道這個寫詩的人，我個人來說，寫詩好像是從童年開始的。有些小孩，他可能將來就會成為詩人，他碰到一個場景，突然發愣瞪着看，這種小孩肯定將來會寫詩，因為他記住了這個場景，記住了以後不一定會常常想到它，這場景住進他的記憶，沉澱成了潛意識。潛意識是夢造成的因素，所以寫詩的時候，當你想碰到一個場景，集中起來，這個潛意識就會跳出來幫助你完成，所以一首詩常常像個夢景。那我們常常碰到一個情景，如果你能夠記住，如果有手機幫你記住的話，那真是個了不起的寫詩的過程。

所以我們說在都市裏生活，讓你寫詩的可能性高於所謂的田園生活，這是一定。因為人類生下來天性就是和平，和所有其他動物都一樣要群居，所以我們的都市越來越大，香港的人口越來越多，都市的大樓越建越多，越來越繁華，大家都想到香港這樣的都市居住，因為人多，其實方便了。我們在鄉下時，要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那實在是好不容易。在香港，其他的大都市也一樣，人和人的交流變得容易，所以在都市裏生活，人和人的交往是合乎天性的，就是群居。群居生活對文學更是有莫大的好處，因為人際關係複雜，這種複雜的關係是產生文學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其實詩有很多的主題，主題是政治的，那就跟都市很有關係，如果是經濟生活，那也是產生在都市裏。所以詩表現了很多主要的主題，都是在都市裏。

我們從詩經裏都可以看出來這點，在宮廷、在廟宇這些地方，所以都市這個地方對寫詩也好，寫小說更不用說了。還有這些偉大的詩表現的題材，除了經濟政治這些以外，偉大的愛情大概都是發生在都市裏。你看莎士比亞寫的許多除了在宮廷之外，譬如說羅密歐與茱麗葉都是發生在都市裏的。所以說重視在都市裏的生活，甚至於利用手機，做一個有文藝素質的低頭族，這個對我們的藝術發

展是很有幫助。我在休息室休息的時候，有同學給了我一本雜誌，《都市文藝》第 68 期，這樣的一個文藝我打開來看了一下，覺得很豐富。所以都市生活和文藝的發展都是合乎人性的，因為人是合群的動物，寫出來的詩要和別人交流的。

我們今天有了許多好的媒介物，有了豐富的都市的生活，所以大家不要錯過這些機會。各位同學，你們要寫作，也許你家還在鄉下，可是你在都市，特別是這所大學叫做城市大學，你和城市生活不可分裂。城市生活雖然是我們看見的大樓、人潮擁擠，可是有很多的情景跟大自然非常相合。清早時你起得很早，你看過去一路的街燈，很少路人，那個街燈的亮光和你們平常見到的不一樣，特別澄亮。黃昏的時候，你看着許多的樓，那些樓有的窗戶打開，有些關上，好像你看着星空。你在都市生活也能跟自然貼近，所以都市是文藝最美好的產生地方。謝謝。

鄭培凱：謝謝愁予！那你自己有沒有用手機寫詩呢？

鄭愁予：有啊有啊。

鄭培凱：那麼下面我們請廖偉棠來分享，他是都市詩人。你有沒有用手機寫詩呢？

廖偉棠：有啊，剛才我們也在討論這一點，用手機寫詩當然比用手寫詩要輕鬆一點，因為手指沒那麼累。

其實我跟林沛理先生一樣，期待這題目期待了好幾年，關於城市與寫作。因為對我來說，城市或是說生活與寫作，是達到了只在當下的合法性。小時候的我一直到 11 歲都是生活在農村，那 11 歲以後的搬到珠海生活，實際上跟農村的生活挺相似的。因為大家都知道珠海是個蠻悠閒的城市，而且我在珠海也是過着蠻陶淵明的生活，每天就是讀書、到處行山或是遊山玩水。所以那時候我的閱讀品味也是很農村，而另外一個就是讀歐洲的浪漫主義文學，或是受浪漫主義影響，那些前期的現代文學。所以說我當時的寫作，完全是在抽離了當下中國的，跟中國當時的時代蠻不同。

那直到 97 年我來到了香港，我覺得香港的生活對我的寫作產

生了改變，就是說那種赤裸裸的當代性進入了我的寫作。這種空間的遷移，實際上是種時間的遷移，我從一個 19 世紀，幻想的，像在 19 世紀中國的一種詩人的位置，一下子跳到了真正的當代。而且來到香港以後，不能每天看書了。於是我書看少了，我看人、看這個城市的機會多了很多。我的詩，還有散文寫作，都變得更加多元素，同時，我們閱讀趣味也有所改變，我開始閱讀很多英美的文章作品。這種歐洲的本土文藝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把當代性的混雜的東西，骯髒的東西，帶進去寫作，這不是審美，是審醜。也是說怎樣才能讓自己作品容量更大，因為我們一般人對詩歌的偏見都是一定要比較純粹或是抒情，要抒發那種隱隱淡存的情感。那我就慢慢的想，為甚麼詩歌不能像小說那樣處理東西。為甚麼詩歌的程度好像要永遠弱於小說呢？

我就慢慢在美國詩歌或英國詩歌裏面學習，所以我覺得中國詩歌也應該慢慢走向極大的未來，不要只停留在山高水深的階段。不是說我是一個生活在城市的人，只能寫城市的東西。後來我又去北京生活了五年，其實我對北京的那個城市也是有一種感恩在裏面。在北京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從外地來，漂泊無定，萍水相逢的愛情和友情，所以這種生活給一個詩人帶來的是，能讓當代詩人有別於古代詩人一個很大的資本。就是說李白沒有上過飛機，沒有上過網，這就是我們的資本。如果我們還去寫月亮的話，那麼我們就真的是一出手就敗了。

最後我想說的一點是，詩人在處理跟現實的關係時，其實剛才閻老師也有提到，在我們面對現在中國這樣的一個氛圍，這個現實是作家好像有一種壓力在裏面。詩歌的方式就剛剛有點相反，中國人的習慣是我們面對一首詩的時候，我們會把它聯繫到詩人的身世上，我們想想這裏面寫的東西會不會在詩人的身世上找到索引呢？所以寫詩的尷尬在於我們是不是在想怎樣與現實聯繫，反而是在想怎樣才能跟這種想法做一個更好的抽離，這是我們當代中國詩歌的情形。謝謝大家。

鄭培凱：那麼下面請香港本地的詩人，葉輝。

葉輝：我要先說一點廣東話，不然林沛理會以為他是唯一說廣東話的人。當我們乘坐地鐵的時候，大家有沒有留意乘搭扶手電梯的廣播中多了一句，不要經常看電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原來看電話是會讓人不安全、分心的。這通廣播的詞彙變化也湊巧反映了一個城市的生活。我身旁的作家，就像北島，他剛才問我林沛理在說甚麼，我就跟他說，沛理剛說的全都是關於城市與評論、城市與自由，可見，我們還是需要點翻譯。所以廣東話的發言就先到此為止。最好不要讓身旁的人翻譯，我剛剛說的廣東話是為了支持林沛理他們。

在城市裏面，我們要保持聯繫是非常容易，因為有手機嘛，打個電話就是知他為甚麼失去了聯繫。坐飛機的時候，一架飛機失去了聯繫，坐船的時候，整艘船海難失去了聯繫。在一個城市裏面，我們坐地鐵，當我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再到另一個城市，幾個城市連成一道鐵路，這叫高鐵。我們已經不光是地鐵的時代，更是高鐵的時代。我們看見一架高鐵掉下，從天橋上掉下，好像一個墓碑一樣，那畫面非常震撼。那高鐵，從高架橋上像墓碑一樣掉下來以後，他們會不會從此跟這個世界失去了聯繫。在城市裏面，失去了聯繫，失聯，都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最近我看報紙、看電視看新聞，都經常看見失聯，失去聯繫這樣一個詞。為甚麼人與人之間會失去了聯繫呢？是故意失去了聯繫，還是被動的失去聯繫呢？失去聯繫在一個城市生活裏面，它是甚麼一個意義呢？它裏面有甚麼含意呢？我們都可以思考一下。

因為聯繫是容易的，但是故意與別人失去聯繫，裏面必定有一些內涵，有一些東西，讓我們去發現，有一些是我們想都沒想過的，或是說我們想過，還沒有用過的方法寫出來，裏面總有些內涵讓我們去尋找。最近那個馬奎斯去世了，是一位哥倫比亞的作家，後來他生活在莫斯科，我想起了一套電影，一套加拿大的電影，跟這本書是沒有關係，但是它中間說到有一男一女，他們在甚麼地方相遇呢？他們在一個老書店、舊書店相遇，他們分開的時候就說要交換

電話號碼。那女就把她的聯繫方法寫在紙上，然後放在一本書裏面。一個舊書店裏面有這麼多書，怎麼能夠把這本書找出來？她隨手找了一本書，這本書就是馬奎斯的《愛在瘟疫蔓延時》。那紙條就放在書裏面，女的就跟男生說，我的聯繫方法就在那書店的書裏面，你去找啊，如果有緣的話，我們還是可以再聯繫的。這個男的可能有兩個方法，一個就是隨便去找，另一個方法就是把整個書店買下來，然後就每天去看書，把紙條找出來。不過當然沒有這情節，男生最後也找不着那女生。他們在城市裏相遇，再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裏頭，他們相互失去了聯繫。

這樣一個故事是一個小情節，我們如果要求要在一個城市裏保持聯繫，然後要想辦法讓這個聯繫困難一點，用一點技巧去包裝這聯繫，中間有很多人為的、故意的造成的障礙，並不是馬上用手機記下電話號碼，因為你這樣輸進電話號碼的時候，他沒辦法記得你朋友的電話號碼。這樣的聯繫跟失去聯繫兩者之間有怎樣的矛盾，又在矛盾中產生怎樣一個心理的情緒呢？我想，還是值得我們思考一下。謝謝大家。

鄭培凱：謝謝。接下來的陳子善有兩個綽號，一個是張愛玲的「未亡人」，一個是新文學的考古學家。

陳子善：我如釋重負，如果按照原來的順序我是最後一個發言。

鄭培凱：好像不是。

陳子善：抱歉，數學太差。我以為我是最後一個發言，我太緊張了，中國有一句成語是虎頭蛇尾，那麼我肯定是蛇尾。那麼再圍繞着他們，發生些有趣的事情或者無趣的事情，再寫成文字。現在科技發達了，今天有錄音；如果今天沒有錄音的話，若干年以後，在座的諸位回憶，2014年4月25日上午幾點到幾點，在這個地方，我們舉行過一屆座談會，來討論文學，討論「生活在城市」，哪些人發言，哪位最先發言，哪位最後發言，每個人發言的要點是甚麼，我想肯定每個人的回憶都是不一樣的，都是有出入的。這就為我們寫文學史提供了現代材料。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回憶。剛

才許先生說，余華的一些方面，他不滿意；也許我跟他也有回憶，但是很滿意。（觀眾笑）別人會說陳子善你說吧，根本不是這樣。所以我就是對這一切很感興趣。當然，也許關於滿意不滿意，永遠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講到城市，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進入城市以後，人的生活變了。我們當年 80 年代在上海，我寫的詩是城市詩；像剛才提到葉先生、鄭先生、廖先生都是「用手機在寫詩」，這是創造，我不知道外國詩人是不是用手機在寫詩。這就是生活在城市一個最細的緣份——用手機寫詩。所以在座諸位生活在城市裏面，我們既然都喜歡文學，喜歡詩歌，有沒有這種氣來和兩位「叫板」，來和「鄭伯虎」比寫「手機詩」，來和廖先生比寫「城市詩」。這樣我們香港的文學才會豐富多彩。我的發言到這結束，謝謝大家。（掌聲）

鄭培凱：我們下面請北島先生給我們講。

北島：你們好。我在四十年前寫過一首詩叫《太陽城札記》，最後一個小節叫做《生活·網》。哪位知道？（觀眾笑）四十年前沒想到會有網的出現，只是偶然寫的一首詩，那麼如果從四十年之後來看變化，真的首先是網絡的出現，沒想到它整個改變了人生活的方式。可以說同學們幾乎都需要網絡、微信等等各種各樣的方式，可以說知識的方式是非常破碎的，可以這麼說吧？因為你們看到的大部份消息、信息、資訊，這就是一種。或者說這裏面有兩個可能：第一個是網絡的問題，我們如果說是障礙，就是對於很多同學們來講，是一個巨大的問題。當然可以說同學們生活得很愉快，因為每天靠網絡生活，得到了大部份消息和資料。但是我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實際上還是挺危險的。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體制。同學們可以說就是一個網，其實我們都在這裏教書，如果要實在說的話，現在同學們面臨巨大的危險——你們的知識本身都已經——（鄭培凱：板結化）很多同學們讀書，可以說讀了以後大部份是沒有用的，甚至我認為是有問題的。當然我有一個疑問，因為很多同學不同意。首先我自己在教書，我看到很多同學他們的壓力有多

大？差不多是一學期七門課。你想七門課怎麼可能呢？七門就已經把自己生活全都網在這兒了。而且我認為這樣有兩個後果：一個是破碎的——我剛才說網——那一部份就是體制化。其實體制化的知識是非常理性的，而且是非常僵硬的知識，尤其在我看來，大學生還好，再往上碩士，再往上博士，那我覺得就更基本沒戲了。（觀眾笑）我是說實在的這樣的感覺，我直接感覺到同學們感到非常的困擾，每個同學都有困擾——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困擾——可能你們覺得愉快或者沒有問題，但我覺得是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現在反過來說，有一個詞叫做「幼稚化」。到了一定的年齡，他們其實不太明白，他們的知識沒有一個變化，沒有更豐富的內容。這一點我也感到危險。所以最近我們在《今天》雜誌做了一期專集，叫做「八零後怎麼辦」，有一個人大的副教授，他其實也是八零後，他直接提出了一系列的疑問，我覺得有機會你們可以在網上找到。他從他的自己生活開始。我先說了一些《生活·網》的內容，那麼我再來說詩歌。其實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說，我們在一個大同化的文化過程中，我們基本上已經被娛樂信息還有隨知識產業化、知識系



統化造成的一個結果包圍了。其實我感到非常的困擾。我從這差不多五年以來，一直與國際詩歌合作，包括兩個大的項目，一個叫國際詩歌節，這是第三屆詩歌節，我還想繼續做下去；另一個叫國際詩人在香港，除了請一些重要的國際詩人參加各種活動，同時出版雙語詩集。還是覺得不夠。所以我現在馬上就要編的一本書叫《給孩子的詩》，一百零一首，主要包括外國詩歌和中國近幾年的新詩。其實我首先是考慮到 17 歲以下的青少年。這個花了很多時間，現在馬上就要出版了，沒有繁體，是簡體的。那麼這是我的一個設想，就是能不能給孩子們造成一種可能性——當然這個還是屬於經營化的，很小眾化，小眾化的也沒關係，只要有沒有一種可能性。我正好在中文大學教詩歌創作課的時候，我正好用了這個教材——《給孩子的詩》，我以為對於大學生來講，這個詩歌太簡單了，其實不是。對於學生來講，只要他們可以閱讀和朗誦，給他們提供一種創作和想像的環境就好。我發現在這個詩歌創作課的過程中，同學們的變化是很大的。在三個月內，首先不要給他們講理論，就是先講講詩歌，讓他們先感受，讓他們背誦——我們要求每個同學必須背誦兩首詩，然後再把這兩首英文詩翻譯成中文。有的同學覺得這很簡單，其實不是。然後第三個再讓同學們寫一首詩，目的並不是讓他們真正寫好，只不過是讓他們有一個詩歌的體驗。所以按照這種方式，為甚麼會在五六年內做了一系列詩歌活動，還有現在更具體的是給孩子們的詩。我認為這樣會有一些改變的可能性。當然我認為同學們也會提出一些疑問，我也很願意來和同學們真實地對話。比如說在體制的大學，我想不光是在大陸，也包括在美國，因為我在美國也教過書，現在包括在香港，我碰到的問題也差不多，就是說我們有沒有一種改變的可能性。所以現在回到我四十年前寫的那首詩，這首詩其實是無法預測的，但是現在可以碰到很多問題。好，謝謝。（掌聲）

鄭培凱：用戲曲舞台的詞，其實演戲演到最後，有兩個詞：一個叫「壓軸」，還有一個「大軸」。這個很多人不知道，以為只有

一個「壓軸」。其實不是。像剛剛北島就是一個壓軸。最後這個大軸就是黃子平。這個說法是提出來反對陳子善的虎頭蛇尾（陳子善：他是壓軸）。（觀眾笑）

黃子平：城市文學節我來參加了前幾屆，非常美，山水啊，自然啊，環保啊，非常好的東西，令人想起綠顏色的符號。但是覺得有點怪怪的，就是說來了城市大學之後發現大學主要的門是開在一個 shopping mall 裏（觀眾笑），世界上還有沒有這樣的大學呢？（觀眾笑）其實是有的。我去到北海道大學，也是先經過一個 shopping mall，然後再出來一看，北海道大學。他們說這個通道設計的合理，因為北海道常年下雪，從那裏鑽出來學生比較安全。總之在這裏討論環保，討論山水、自然，其實這種主題和空間的辯證意識是不錯的，恰恰是走在這種地方才會嚮往自然山水。那麼今年就老實一點，「生活在城市」。所以我準備了很多關於我自己生活在城市的一些體驗來講。屈指一算，半輩子生活在北京、廣州、香港，加起來也超過了半輩子，這些體驗可以講講。後來吃飯的時候培凱說，講講你是怎麼走上文學道路的？那就都發生在鄉下了。（觀眾笑）剛才其實閻連科他們幾位都講了，雖然愁予說都市和文學關係非常密切，但是在鄉下走文學道路的動機更為強烈。就連科說的吃不飽，體力勞動非常繁重，就想怎麼樣改變命運——非常不崇高，但是非常強烈的這樣一個動機。我開始也是學寫詩的，學的時候像赫爾德林、里爾克、北島知道是個作家，我就讀到賀敬之，賀敬之寫甚麼呢？寫「樓梯體」。寫甚麼「無邊的大海浪花滾滾，/ 無邊的大海，浪花，滾滾」（觀眾笑），適合朗誦，非常鏗鏘有力。後來發現學這種東西很有好處。因為我們那時稿費是一千字十塊錢，二十行詩，有一千。（觀眾笑）一行詩五毛錢。五毛錢甚麼概念呢？五毛錢在當時的廣州街頭可以斬一盤白切雞。（觀眾：哇）所以我們那時候寫詩呢就：「啊，白切雞！」（觀眾笑）豪情萬丈。所以「我是一個中國人」，就一盤白切雞；「我 / 是 / 一個 / 中國 / 人」，五盤。

（觀眾笑）所以稿費尺度和問題的關係應該是一個碩士論文吧？我們當時跟誰簽了一個合同，按頁算稿費，所以我們的小說都變成這

樣：「劍」，一盤；「一把劍」，又一盤；「一把出鞘的劍」，三盤。（觀眾笑）「一把寒光閃閃出鞘的劍」，四盤。到五盤應該是甚麼？（觀眾笑）所以這是一個稿費的問題。反正說起來走向文學道路的動機就是這樣單純。不過說起來鄉下的生活，稿費是城裏發出來的，這非常重要：雜誌在城裏發的，賣給城裏人；所以你在鄉下寫詩寫甚麼也好，其實你是想往城裏去的，到了城裏邊就成詩人了。所以這個非常的吊詭。我有一個中學同學，他是山裏人，在福建、江西、廣東交界的地方，他後來跑到深圳去，在深圳發財了，賺了很多錢，想要報答鄉里，帶了幾百萬塊錢回到鄉下山莊，叫我們這些同學過去坐，第一件事說「哎，網絡通了沒有」。所以鄉下這樣一種非常接近自然的生活必須以城市所提供的現代條件為基礎。你們知道韓少功半年在南島，半年回到楚原——屈原流放的地方，弄了一個兩層樓，在那個地方大隱隱於鄉下。他在的樓上裝了三個衛星天線——三個鍋，能知天下事。然後政府經常來掃蕩這些衛星天線。所以我們現在所謂自然山水環保全部是建在城市所提供的現代的條件之上，不論我們生活在城市也好，生活在鄉下也好。子善應該知道，毛主席說，農業是基礎，工業是先導。其實現在所有的農業都建立在工業的先導之上，化肥、農機、水……都是工業所提供的。所以毛主席以前說，「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其實農村的天地是最狹窄的。知識青年到了農村，一個當老師，一個當衛生員，一個當文書，沒啦。（陳子善：一個種地）種地的不是知識青年。人家說，「逃離北上廣」。逃離北上廣到甚麼地方去呢？沒有文化，沒有任何可以施展自己學到的知識的天地。所以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裏：將來的世界會變成一個大都市來統治世界的一個狀況，有點回到當年的新加坡、香港、倫敦、紐約，這樣一個事情，所以願不願意你就非得生活在大城市。謝謝。

鄭培凱：所有的文學、想像，是很複雜的，環境是很複雜的，可是文學重要的還是你能夠有一定的自我超越，像剛才講的，他城市的半邊出發的時候是農村出發的。我們現在還有點時間，我們可

以請下面提問。

觀眾甲：我想問一下北島教授，您剛才提到對於碩士、博士的一種失望，您能不能具體談一下，是怎樣的一種失望。

北島：我從來沒上過碩士、博士，只是想像。因為我覺得做博士肯定是特別吃苦的一件事。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讀過博士的（對各位嘉賓），我估計有一段時間理工的做博士很普遍，但如果學文學讀博士有點問題。這博士只是一個大致的概念。

鄭培凱：我想補充一句。我是得了博士。（觀眾笑）關鍵是這樣，得博士的人一定是搞專業的研究的，那麼這個對於文學創作沒有甚麼太大的幫助。因為文學創作，寫詩的話，是從心裏面對整個世界的一種感受。但你如果讀文學博士的話，你是研究北島，研究北島經營的感受。（觀眾笑）我覺得他講的非常清楚，具體把自己狹窄到一個地步去專注做研究，這和文學創作是兩個不同的部份。大概是這個意思。

北島：還有我認為這些年來體制化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體制化其實就是不斷的分類，分的特別小，然後做的那個研究幾乎沒有人做，也不會出版，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挺危險的問題。尤其是女孩子，是吧，（觀眾笑）去讀書一定要讀博士，最後能寫寫文章，再出版，太費勁了。而且一定要去做教授的話，這個太難了。

鄭培凱：現在有個詞叫做「學術職場化」，它有很清楚的目標的，就是找一個職業，這裏有個市場，能夠有碗飯吃。他們一開始創作不都是為了找飯吃嗎？其實蠻有意思的。

觀眾乙：各位老師好，我有一個問題。我正好是在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工作，所以我剛剛聽到閻老師和許老師講到茅盾先生的手稿值一千二百萬的時候，想到北島先生之前其實把他的《今天》雜誌的很多作家和詩人的手稿捐給了城市大學圖書館，同時也捐了很多其他的手稿給香港其他的大學的圖書館。所以我想到這個的時候就更加覺得今天的這個討論更加有意義。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我看到詩的時候，或是看到給我啟發很大的文學的時候，心情是很沉重的。我不知道文學家在創作的時候心情是甚麼樣的，總的來說

是在比較高興的時候會寫出思考的文學呢，還是說在你們心情比較沉重或低落的時候才會寫出一些在我們看來比較啟發的文學。如果這樣的話，通常你們的生活到底是比較沉重的呢，還是比較高興的呢？謝謝。（觀眾笑）

鄭培凱：我想說一下剛才的那個問題。剛才你的那首詩是用手機寫的嗎，那不好，因為你沒手稿。（觀眾笑）損失了一千兩百萬。李銳，你那個《張馬丁的第八天》挺沉重的，講講。

李銳：我想這個是兩回事，就是一個人總要吃喝拉撒睡，總要有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後一個人創作的時候總要進入另外的精神狀態。我覺得作為一個創作者，當他創作的時候是全身心地投入、沉浸到自己的文字裏去，會跟着自己人物的命運一起高興、一起悲痛、一起歡呼。但是他停下筆來，轉過臉來的時候，他的旁邊是他的愛人，（觀眾笑）還有他的孩子，告訴他中午的菜炒好了，準備吃中午飯。他就得從他那個世界裏站出來。其實這個一點也不全面。就好像你走進廟堂，點燃一炷香插到神龕之前的時候，你的精神狀態，你的所思所想，在那一瞬間，你要與神通話。你走出廟堂來到陽光下、見到一個飯館要吃飯的時候是一個普通的時刻，這個我覺得沒有那麼神秘。其實人本身就有一個這種雜想。所有衣食住行之上，剛才我說的琴棋書畫，其實這兩者都是屬於人本身。人的所有美好和醜惡加在一起才叫人。好了，就說這麼多。

鄭培凱：我們看另外兩位小說家是怎麼理解這個問題。李黎。

李黎：我非常同意，就是說這裏面有各種精神層面和身體的狀態，所以其實在寫作之前的思考、閱讀、準備工作，寫作時候的沉澱狀態，跟寫作完釋放的狀態，都是不一樣的，而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體驗。

鄭培凱：連科呢？

閻連科：吃飯，吃飯。

鄭培凱：他分得最清楚是吧！那詩人是怎樣的呢？愁予你先說吧，你分得清詩的世界，和吃飯的世界嗎？

鄭愁予：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我想的問題常常是人類的

狀況，人類的狀況不僅僅吃飯，還有很多其他的狀況和問題。詩不是優先，但是更需要用思考來寫的。（鄭培凱：進入詩的境界，你很容易就脫出了）因為今天的題目是城市，人類最快活的詩是大自然詩，我想實際上寫詩，真的不能夠幫助甚麼實際的生活，因為我們人類從食物鏈裏出來，過去人也是一些動物的食物，現在人成了吃任何東西，這個成就很大。人類有能力創造第二自然，第一自然——時間、空間是上帝創造的，而人類創造出詩。這個山架高了，就不動了；只有城市的樓一直往上加高，當樓像山一樣高的時候，我們人類覺得可以站在樓上，看很遠的地方。這就是人類創造第二自然。當真正生活在城市裏面，我們會覺得吃飯是重要的，我們知道在香港有個詩人寫吃飯寫得出神入化，我非常欣賞——剛才我沒聽清楚這個問題（鄭培凱：他生活在詩的世界）。我們的食物鏈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鄭培凱：蠻好的。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午還有分組討論，到此結束，謝謝大家。